

我 1914 年（民国 3 年）夏天在哈尔滨齐红桥（南岗通往道里的要道）旁的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出生。那一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

松花江畔的哈尔滨，是我国东北三大名城之一（另两个是沈阳和大连），“哈尔滨”三字是满族语，意思是“晒鱼网的地方”。当时的人口 250 万。此地从前是荒凉的渔村，1898 年（清光绪 24 年）清政府和帝俄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约，俄取得特权，在东北建筑由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海参崴的“中清铁路”（后改称“中东铁路”），哈尔滨遂成为铁路的重要交汇点，也是欧亚交通中心，正式成为商埠。

哈尔滨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：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。郊区有上号，顾乡屯、偏脸子、马家沟、懒汉屯等。1917 年（民国 6 年）俄国发生十月革命，成立了苏维埃联邦，沙皇被推翻。大批俄国人逃亡到欧洲或我国东北，尤以哈尔滨为多，几乎占哈尔滨人口的三分之一。这些“白俄”（“白俄”一词，来源可能是：苏共自称“红党”、“红军”，把帝俄时代的官员、地主、富商以及自由知识分子视为“白”）多属于上流社会，文化程度高，经济富足，生活优裕，在哈尔滨从事文化艺术的传播，组织音乐、文学社团，成立绘画、戏剧机构，举办演奏、出版、展览。城里的学校、书局、画廊、博物馆、教堂、商店、餐馆，从建筑到室内装潢完全欧化，尤其是道里，街道及市容最是俄国化，有一条马路叫“中国大街”，全部用石块砌成，路灯明亮，宽敞的人行道上有座椅，两旁大多是俄国人或欧洲人开的商店及餐馆。哈尔滨得风气之先，最先接触欧洲的书籍、刊物、影片、唱片、美术、音乐、文学和歌舞，成为中国最为欧化的城市之一。

哈尔滨被国人称为“东方小巴黎”，欧俄文化在城市里日益发扬光大，居民尤其是知识份子受到程度不等的潜移默化。俄语成了中国人所学习的第一种外国语。在这座华洋杂处，亦东亦西的都市，我生活了 17 年，一直到 1931 年初中毕业。

我出生后，父母为我取名“聚聚”。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寓意：他厌倦了离乱的生活，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，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。但是，事与愿违，我们的家不但没有“聚”，反而“散”了，散得那么彻底，那么悲惨！

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，是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几乎一无所知，就连同她的长相模样都不复记忆了。她去世时我仅仅两岁半，弟弟复成刚刚出生。我身边曾经有过一张父亲母亲和我合拍的照片，后来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向

华北进犯，全国人民忍无可忍，奋起展开抗日战争。战乱期间，学校停课，各地学生纷纷向大后方流亡，颠沛流离中，我遗失了这仅有的珍贵照片。

我只知道母亲娘家姓李，名字不详，出生于山东掖县平里店东路宿村。她是大姐，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她和父亲结婚后，到了哈尔滨，在那里大概住了三四年，生了两个孩子。年纪轻轻一生就结束了，她故去时有多少岁？因何病而丧生？我都不知道。那年代，从山东河北到关外（山海关）闯荡的人，假若在外死亡，灵柩一定要运回老家安葬。就为了这，父亲辞去工作，安顿好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，护送母亲的灵柩，离开哈尔滨，往山东老家掖县平里店朱由村。这是一段艰辛漫长的路程，得先乘南满铁路的火车，自哈尔滨到辽东半岛尖端的商埠大连，在大连改乘轮船，横渡渤海湾，到山东省烟台，再从烟台乘汽车沿烟潍公路（烟台到潍县）到掖县平里店，下车后，换乘由马或骡子拉的大板车，走二十来里田埂小路，其间经婴里村（宴婴故里），麻渠村（孙家世居），东路宿村（我外婆李家住地）和西路宿村（复钧兄弟外婆王家住地），最后到朱由村。朱由村是濒临渤海莱州湾的一个村庄，属鲁东掖县（掖县是军阀张宗昌的家乡，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闻名全国），大概有三百多户人家，多半姓张。这里的居民忠厚、朴实、勤俭、乐天知命。据说我家祖先是明朝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时，逃离成都，几经播迁，终于定居鲁东，到底有几代在山东掖县居住？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我祖父张吉亨早年丧偶，膝下只有我父亲张日高（字升三）和一个叔叔（不知道名字），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。

张孙两家的老人们，大约在清朝光绪廿二年即西历 1898 年前后从原籍鲁东，随着一批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背着简单的行李，不顾清廷禁令，千里跋涉，私自出关（山海关），赤手空拳地到地大物博，人口稀少的东北闯天下。那个时候的东北，是俄国和日本争吃的肥肉。俄国借口代我向日本索还辽东半岛，要求酬谢，获得了在东北筑铁路的权利，并且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。俄人在 1898 年，以哈尔滨为起点，向东西国境及旅顺大连三方面，分别铺设路轨，于 1903 年即以闪电方式建成中东铁路。中东铁路全长 2430 公里，以哈尔滨为中心，西北至满洲里，东至绥芬河，南至大连。修筑铁路需要大批年青力壮的劳工，而当时山东、河北两省民众，因为在原籍谋生不易，纷纷冒险出关另寻生路。我的父亲张日高和弟弟，才十七八岁，有的是力气，离开家乡，随闯关东的大流，到了完全陌生的东北。他

们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忍饥耐寒，走遍松花江流域的大小城镇，胼手胝足，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，吃尽苦头，付出血汗的代价，建立起自己的家园，繁衍后代，家族日逐兴旺。

这个开辟草莱的群体，年富力强，敢冒险，能吃苦，其中一部分人将多年积蓄投入工商业，另求发展，风生水起，渐渐掌握了东北经济的命脉。另外一部分，苦学俄语，在铁路筑成后，成为中东铁路局的员工，由于精通俄语，很受俄人重视，所获待遇以金卢布计算，格外优厚。我父亲在东北奋斗了十余年后，有了谋生技能，也薄有积蓄，遂返回老家成亲，带着新婚的妻子，再度返回哈尔滨。至于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叔叔，不知是和父亲同时还是几年后才动身，千里迢迢去了东北，一去就失去了联络，至今渺无音讯。

朱由村虽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，但是我对这个靠海的小村庄怀着深厚的感情。那是我们张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之处。1936年和1937年（民国25、26年），我两次到朱由村去，那时我已就读北平燕京大学，利用寒暑假回到山东老家，和从哈尔滨赶回去的父亲聚晤。我之所以没有前去父亲定居的哈尔滨，是因为1931年（民国20年）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，对中国人百般刁难，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控制，无辜者遭逮捕和杀害的消息时有所闻，因此，父亲报我“已死亡”，名字从户籍上取消。

1937年6月回朱由村的记忆至今清晰，我在燕大已读完3年，还差一年就毕业，利用暑假，和父亲约好在山东见面。我从北平乘津浦铁路的火车到济南，换乘胶济铁路火车到维县，下车后，改乘烟潍公路局的汽车，行驶三四个小时，途经掖县县城，到平里店。平里店是烟潍公路上的一个小镇，那里有电报和邮政局。父亲先我几天到家，我抵达时他在平里店迎接。父女两人坐上早已雇好的骡拉板车，摇摇晃晃地顺着麦田中间的土路缓缓前行，花了一个多小时。远远看见了红砖砌成的围墙，墙内分三个院子，每个院子里有一排三间的房子，房子虽老，但都经过整修，印象最深的是屋顶上铺着一层层晒干的海草，厚厚的（有人说是海带），据说这种草产自当地，铺在屋顶，不漏水不透风，使房子冬暖夏凉，便宜实用。家家户户都一样，怪不得离村庄远远的，就闻到咸咸腥腥的海草味。记得三个相通的院子外，还有一个小里院，院里靠边堆着烧火用的木头、枯枝等杂物，不远处有两棵枝叶茂

密，年年开花结果的桃树，中间是一个露天的大粪坑（厕所）。一进大门的院子里，住着大奶奶，她是父亲的伯母，伯父早亡，无儿女，她由父亲奉养。并排另一院子，两明一暗的房屋，供父亲和我暂住。院子里还有一口深井，家中用水都由此汲取。这是夏天，赶集的日子（五天一集）一到，父亲便去买些西瓜回来，盛在打水用的木桶里，放进水井泡着，傍晚时一家子在院中乘凉，就吃上冰凉凉的西瓜。第三个院子里，住着瞎了眼的奶奶。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，我亲祖母在我父亲十来岁时就故去了。

我所见到的庶祖母是怎样嫁进我家的呢？我诞生以前，有一年山东干旱，各地闹饥荒。一批难民逃到我们村子里，其中有一个寡妇，从平度那边过来的，30多岁，孤苦伶仃，在我家门前乞讨。那时我家人口单薄，正需要人来照顾祖父及两个稚儿，就把她收留了。从此我家就称她为奶奶，那时她的双眼还未失明。此后的年月，多亏有她撑持老家的一切家务，父亲和叔叔才放心离开，到东北去谋生。祖父去世后，家中破屋她独自居住，几亩田地也由她照料，直到父亲在东北立稳脚跟，赚了钱。父亲陆续把钱寄回老家，把房屋整修重建，老人家的生活才得以改善。

说到我的外婆家，我知道的就更少了，只知道姓李。李家世代代居住在与朱由村相隔十余里的东路宿村。外公外婆家中有四女一男，我母亲居长。我两次回朱由村，都到外婆家住一两天。那时外祖父已去世多年，小舅舅也死了，家中只有外婆和四姨。二姨随丈夫到东北一面坡经商，我没有见过她，三姨到哪里去了，我没有印象。那时四姨已出嫁，丈夫到关外谋生，一去十几年没有音讯，四姨只好回娘家长住，和老迈的母亲做伴。外婆的家境十分凄凉，茅屋仅可遮蔽风雨，教我看了十分难受，但我还在求学，并没有收入，无力济助。倒是父亲时时不忘送点钱过去。那一晚，在外婆家过夜，三人睡在炕上，我和四姨睡一头，外婆睡在另一头，合盖一床棉被。夜里外婆紧抱着我的双脚为我保暖，四姨则两臂搂着我御寒。唯一的小舅舅，模样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。但记不清是哪一年，他大概只有十七八岁，到哈尔滨投奔父亲，父亲介绍他去店铺当学徒。父亲第一次带他进家，他穿蓝布长衫，脸面清瘦。父亲对我说：“这是你娘的弟弟，你亲舅舅啊！”小舅兴奋地握着我的小手，不自觉地流下了泪。以后他又来看过我几次，有一次他咳嗽得很厉害，几滴鲜血溅到地板上，从此没有再来，父亲说小舅舅有病回山东家去了，不久听说他死了。

他来去匆匆，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这一点。四姨个子高高的，瓜子脸，眉目清秀，落落大方。我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一点印象，直到现在，只要想到母亲，眼前泛现的就是四姨的模样。家乡的人都说四姨长得很像当年的母亲，而我又酷似四姨，这么说来，我大概很像我的母亲。